

民族文化 资本化

马翀炜 陈庆德 著



民族文化资本化

马翀炜
陈庆德
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英春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文化资本化/马翀炜、陈庆德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ISBN 7-01-004202-0

I. 民… II. ①马…②陈… III. 民族文化-研究
IV. G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5288 号

民族文化资本化

MINZU WENHUA ZIBENHUA

马翀炜 陈庆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4202-0 定价:18.5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

——《易·系辞》

目 录

引言 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实质与意义 (1)

1

第一章 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与经济 (25)

一、作为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 (27)

“朕即天下”与民族标签——文化的定义——“文化”，
从单数到复数

二、夷平与凸显并存的现代社会 (33)

“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大量使用——现代社会的后果：
夷平与凸显——经济的强势与文化的资本化——众神喧
哗的意义

三、社会发展的目的与手段 (42)

新的生存条件与新的存在方式——现代世界体系的
合谋者——作为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自由——参与和
发展的公平性保证

四、多样性生活方式的寻求 (50)

行动者的可行能力——对待文化变迁的态度——制度的激励机制——民族文化资本化

五、发展研究的理论预设 (55)

经济人类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没有“皇帝”的“新衣”——发展的哲学思考——发展的尺度——学科的公理基石

第二章 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社会基础 (63)

一、现代资源配置中的民族文化 (64)

资源配置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发展问题——现代化的陷阱——“拿来”与“克隆”

二、民族文化符号的功能转换 (83)

发现“新的文化”的必然性——商品的效用与文化的选择——文化符号的功能转换——一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一个小康村的故事——“如果我们有更好的火器”——解毒剂、装饰品和粮食

三、民族文化的抗辩与资本化 (102)

“寂静的春天”与满眼的土著——冷冰冰的数字使人不再高唱“只有一个地球”——公平：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沉默的大多数”与新世纪的大合唱——适应与迎合

第三章 社会结构与文化权利的实现 (117)

3

一、社会的结构与场域的逻辑 (118)

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审视民族经济的文化视角——社会的结构与场域——“随心所欲”与“不逾矩”——马戛尔尼和乾隆皇帝争夺什么？——美洲白银与三等车厢

二、民族经济的文化相关性 (132)

富国策与经世济民——对经济理性的不同理解——作为资源博弈工具的民族——火车头与扳道工

三、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实现 (142)

构成经济过程的基础性要素——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钢斧改变世界——尽入彀中的天下英雄——九鼎的斤两与“波特拉赤”的毯子

第四章 人力资本与社会发展 (153)

一、人类学视野中的人力资本与知识经济 (156)

科学技术知识与价值标准知识——人力投资与经济增长——贫困恶性循环论——一个真实的谎言——知识经济战略——地方性知识的失语症

二、人力资本中的地方性知识 (166)

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忽视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教育——理性的复杂性——文化的分布与权利的分布——“传统就是知识”——“深蓝”不计算生存的意义

三、民族文化在人力资本中的价值实现 (180)

财富的来源——“劳动”变得如此重要——“脱贫计划”的失败——几乎被取缔的中医——“暴发户”们的知识——严重的隐性资产流失——麦当劳、酸吧菜及霍皮蓝的游戏

第五章 文化变迁与民族发展空间 (193)

一、民族文化变迁的现实 (195)

冰红茶、纯净水与老井——伪民俗与真民俗——墨西哥的玉米何时发芽——马的威风与桑塔纳的气派——黄金时代是什么时代——马凌诺斯基喜欢土著吗？——自愿，谁的自愿——摘下的美丽果实

二、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必然性 (208)

5

苗族服装该用什么做——真古迹、假古迹——“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柴火还是审美，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环境伦理”与“环境正义”——扩音器与话语权——不再无声的合类性与不再沉默的大多数

三、民族发展空间的变化 (225)

“致命的自负”——“传统”吗？有多少个？——百褶裙的价格与改火仪式的复活——应当做什么与将要做什么——享有自由与承担风险

第六章 制度融合与民族文化资本化 (248)

一、民族发展的制度性基础 (249)

世界与个人——物质文化的精神化与精神文化的物质化——“纯文化”与“杂交文化”——现代旅游业的制度性基础——现代旅游业对旅游本质的遮蔽——重新编码

二、民族发展的制度框架 (268)

交往的框架——“库拉圈”的手镯、土布艾群岛的土豆以及“自由市场”神话——布罗代尔：经济体与非经济体之间没有截然分野——卖的是文化吗？——化装舞会与现代旅游——消费异文化与自我身份的提高——神圣性与马赛克——“带着镣铐跳舞”

三、民族发展的目的追求 (287)

发展到底是什么？——没有历史的“历史的终结”——差异性与共同性——何处寻找幸福感？——“一统江湖”抑或“和而不同”

参考文献 (302)

后记 (317)

引言

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实质与意义

作为民族学、人类学中心论题的“民族文化”，是一种“特殊性”的存在。它既是特殊条件的产物，其运行和生存也诉求于特殊的条件或环境。这也使“相对性”问题成为了民族学、人类学话语的基本特征。而作为经济学中心论题的“资本”，则是货币的结晶。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它首先是表现一切交换价值的平等关系的東西；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特殊性目的来使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在本质上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而“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① 货币在“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① 它使交换双方彼此只代表交换价值本身的抽象的社会的人而发生关系;使交换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使财富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这样就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的一般性。”^② 这样,在从前的形式中掩盖着交易的那种适意的外观就消失了。正是“在这种形式上,财富完全摆脱了地方的、自然的、个人的特殊关系”,^③ 也正是在这种形式上,经济得以从物物交换的情境制约中解脱出来,使交换在原则上不再同任一特定的场所联结在一起,使人们能跨越时空地组织和调整“产品”和“存货”。这样,货币和资本成为了“贮存和转化资源的手段”,“扩张的手段、时空伸延的手段,因而也就是权力工具。”^④ 正是依凭于一般化的诉求,货币和资本得以转化为“无个性的”财产;得以获取作为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关系存在和运作的资格或条件。惟其如此,“规律”成了经济学话语的口头禅。

在这两种存在基础和诉求的尖锐对立中,何以能够提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是民族文化的资本化何

-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
 - 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0页。
 -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页。

以可能? 要求资本的一般性和全球性屈从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地方性,那资本不复成其为资本;要求民族文化向一般性或普遍性层面的提升,将导致民族文化特殊性与地方性特征乃至自身的完全消失。这是一个在最直观层面上的提问,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意义的提问。对此的直接回应是:且不说资本就是货币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并非每一货币都是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内含着对某种特殊条件的要求;进而,面对货币和资本这种制度性的存在具有一种决定和调动整个社会生活的无形的、幻想般的力量的事实,如果看到其所以能发挥把社会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的功能,是与社会的传承因素紧密相关的。那么,所谓的“规律”或资本的一般化诉求,不过表达了一种“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身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①这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殊性的表达,我们实际也看到了货币和资本丧失了它的“普遍性,而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种种现实存在。^②然而,止步于此并不能对上述提问做出根本性的回答。它要求我们把讨论深入到关于人类知识与认识的根本性问题上。

3

二

知识是什么? 简言之,知识是人们掌握整体世界的方式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9—670页。

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

成果。马克思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①也可以说，知识是理性的产物。但进一步的问题有如康德所说，知识或理性“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②从而，知识并非所谓客观实在的奉献，而是人的思想的结果。毋庸置疑，知识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并非具有完全的绝对性。从而，知识的根本性问题不在于所谓的真实性或确定性，而在于人类的一切知识体系都不能原原本本地把握“现实”。现实具有无限多样的内容，人类的一切知识体系都是从一定的观点出发来把握这类现实。我们的宇宙带有我们心灵的印记。人决不能等待自然界高兴起来显示自己的秘密，他必须质问自然界。他必须根据他的怀疑、他的猜想、他的理论、他的想法、他的灵感来盘问自然界。人正是以发现这一创造性的艺术，创造了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乃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发明的理论对可观察的事实所作的解释。如果承认，存在并非对象的一种性质，它是依凭其进入某个价值体系而被确定的存在。同时，“对象、思想、事件的价值从来不是从它们纯自然的存在与内容中推断出来，而且它们依据价值而来的秩序与其自然的秩序有很大的分野。”^③从物质原子论，牛顿力学、量子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种种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② 参见[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

③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人文观点和社会理论,不过描述了人类对现实直觉的一种认知模型的思维创造。

因此,知识是对现实世界的概念的占有,通过这一对现实世界的特殊掌握方式而与现实世界相关;知识的精髓就是我们在理论总问题的领域内并用这一总问题的术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已经至少暗含着一套相互关联的理论与方法的信念,以容许做选择、评价和批评,这使我们面对的事实已不再是“纯粹的事实”,也表明了知识的内容“总是历史地有条件的,并且它们缺乏其概念所意味的绝对的特性,同样地,关于完美的知识的终极假设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有条件的,且仅仅是主观真实或相对真实的,而是,在任一时刻有效的每一个单独的假设也应该而且必须被如此看待。”^①

恩格斯在评价《资本论》时就指出:“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如果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②,那么,其中隐含的表达是,任何知识和术语自身都包含着特定的、有限的理论体系。阿尔都塞也认为:“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所遇到的困难,大部分来源于它们在处理(描述性的)民族志‘事实’和‘材料’时没有从理论上注意建立它们研究对象的概念:这种疏忽注定了它们要把那些对它们

5

①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4页。

来说实际上规定着经济的范畴,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而且往往是经验主义的范畴应用到民族学的现实上去。”事实上,“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规定和分配。”^①这就使“我们可能意识到同一生活内容既是实在的又是有价值的,但该生活内容在两种情形下导出的内在命运却有截然不同的意义。”^②

对这一事实理解的深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 20 世纪的社会科学中无疑具有拓疆辟路先锋启示意义的语言学。如果说,人类对自身生存和世界存在理解的一个最基本的途径是话语,知识最基本的载体是语言。那么,语言自身的含混性在根本上规定了知识的不确定性。

它使我们看到,语言既是一种表象思想的工具(数理),而具有形式化的意义,也是一种阐释的工具(政治与社会),而具有历史沉淀的批判价值;还是一种自在的技巧(文学),而形成语法或规则。这在根本上导出了主体的多样性:主体既有其观念和理性的维度(意识主体),也有其文化和历史的维度(历史载体),还有虚构和创造的维度(社会传承)。这便在无意识对意识的入侵中,显现了人作为意识与无意识统一体的存在。索绪尔对语言生命条件的关注,尤其是“所指”与“能指”范畴的提出,启示性地表明:当人们通过言说来诠释事物时,语言这个以集体习惯、以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8、209 页。

②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 页。

约定俗成为基础而被一个社会所接受的表达手段,已经暗含着一套相互关联的理论与方法论的信念,以容许作选择、评价与批评,这意味着被言说的事实已不再是“纯粹的事实”了。就表达意义的言说本身来看,它一方面承认“所指”大于“能指”,即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一方面又预先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正如福柯所说:“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① 因此,尽管语言与事物的对应并非完全的任意或空洞,而具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但这种对应并非完全重合。这一根本性的制约,使我们为认识和理解事物而进行的一切比较,成为“一种重建事实的方法”。^② 语言在传递既有意义的同时创造着新的意义,历史形成的视野(成见)和作为一种翻译或传达行为的言说的特性,限定了“认识”与“不认识”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一定“成见”的平台上理解所有事物的事实,要求理解到各种不同的话语、各种不同的理论要求的范围和限度,并确立起“以有限对应无限”的基本的知识态度。

在种属单生意义上的单一人种与多生性多样化语言的对应中,也展现了作为不同认知模式产物的知识的局限性。它提出

① [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产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② [瑞士]费尔南迪·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页。